

中国学术史系列

中国兵学史

赵国华 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中国学术史系列

中国兵学史

赵国华 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绪 论

人类社会的进程，并不总是一派光明，也常有阴暗的时候。和谐造就和平，冲突引发战争。战争与和平做伴，冲突与和谐毗连。和平隐藏着战争，和谐包含着冲突。人类为了争取和平，消除战争，避免冲突，实现和谐，既需要和谐、和平的理念，又应有冲突、战争的筹算。因此，以社会文化为背景，有关战争、战争指导和军队建设问题的研究，就形成一门学问。

一、中国兵学的基本内涵

中国兵学，作为中国传统时代探讨战争、战争指导和军队建设的原则和方法的学问，从春秋时期形成理论体系，经历秦汉迄明清的发展和演变，直到晚清让位于近代军事学，大体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，在中国军事史和学术史上，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。

（一）兵、兵学和兵学史

在中国传统时代，“兵”字的含义很广，本义指武器，如《周礼·夏官司马》：“司兵掌五兵五盾。”汉代郑玄注：“五兵者，戈、殳、戟、酋矛、夷矛。”《荀子·议兵》：“古之兵，戈、矛、弓、矢而已矣。”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：“其长兵则弓矢，短兵则刀铤。”《说文·升部》则解释说：“兵，械也，从升持斤，并力之貌。”又指士卒或军队，如《左传》昭公十四年：“简上国之兵于宗丘。”唐代孔颖达疏：“兵者，战器之名，战必令人执兵，因即名人为兵也。”《战国策·赵策四》：“必以长安君为质，兵乃出。”

又泛指军事活动，如《孙子·计》：“兵者，国之大事。”《左传》隐公四年：“夫兵犹火也，弗戢，将自焚也。”《汉书·项籍传》：“军未战先见败征，可谓知兵矣。”这说明“兵”作名词，包含人、物、事三层意思，也如前人所说：“古有兵革、兵戎、治兵、用兵之言，斯则武事之总名也。”^①

“兵学”一词，最早见于北宋时期。郭雍著《冲晦郭氏兵学》，即以“兵学”作为军事著作。郭逵“忼慨喜兵学”^②，则以“兵学”作为军事学术。明代茅元仪编《白华楼书目》，在图书分类中把兵书改称“兵学”，这个概念一直沿用到近代。1903年出版的《新学大丛书》，分为10编77类，其中“兵学”一编，包括总论、教条、战术、阵法、操法、马术、工程、学校、兵器等9类。1906年出版的《战法学教科书》，把“兵学”定义为“武学之总称，战争之学问”。1933年出版的《军事学通论》指出，“军事学即我国所谓兵学”。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出版的《红星报》，开始使用“军事科学”一词。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编写的《军语画一》，把“军事科学”正式列为通用军语。

所谓兵学，指研究战争、战争指导和军队建设的原则和方法的学问，如果加以时间上的限定，则可以断其上限于远古时代，断其下限于晚清时期。兵学作为传统学术，与军事科学相比较，存在着时代的差异。不过，如同每一种学术形态，兵学也包含主体、客体、载体三个组成部分。

兵学主体，即兵学研究者，通常被称为兵家，严格说来，应该称兵学家。从春秋战国时期起，伴随军事历史的演进，涌现出一大批兵学家，如孙武、吴起、孙臆、尉繚、韩信、任宏、曹

① 阮孝绪：《七录序》，见《广弘明集》卷三。

② 《宋史·郭逵传》。

操、诸葛亮、李靖、李筌、许洞、曾公亮、何去非、张预、施子美、陈傅良、刘寅、赵本学、戚继光、茅元仪、王鸣鹤、郑若曾、孙承宗、焦勛、魏禧、朱壘、汪紱等人。他们以不同的方式，对于中国兵学的发展，作出重要的贡献。当然，兵学研究并不限于兵学家，一些政治家、思想家，如孔丘、墨翟、商鞅、孟轲、荀况、贾谊、晁错、王符、杜佑、杜牧、赵葵、苏洵、叶适、陈亮、辛弃疾、李贽、唐顺之、徐光启、顾祖禹、魏源、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张之洞等人，在他们的各种著述里，也讨论过许多军事问题，成为中国兵学史的一部分。

兵学客体，作为兵学的研究对象，包括战争、战争指导、军队建设以及相关问题。战争是为了一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利益而进行的武装斗争。战争指导包括两个方面：战略，即对战争全局的策划和指导；战术，即进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。军队建设是为了增强国家军事力量，提高军队战斗力而进行的一系列的活动以及相关的制度和措施。从学术的角度说，研究战争问题，就是要研究战争的起源、发展和消亡，战争的性质、作用和影响，以及战争与政治、经济、科学技术、意识形态和自然条件的关系。研究战争指导问题，就是要研究战争胜败的因素，策划、指导和实施战争，说明作战的原则和方法。研究军队建设问题，就是要研究军事领导体制，军队的组织、管理和指挥，军官的培养、选拔和任免，军事训练的基本原则和方法，以及武器装备的研制和使用。此外，天文、地理、医药、占候研究，也都与兵学密切相关。

兵学载体，作为兵学研究的记录和传播工具，通常被称为兵书，也就是传统军事著作。它主要用于记述人们对于战争、战争指导和军队建设问题的看法，是兵学研究的最终成果，体现出传统军事学术的水平。从编写体例看，兵学著作可以分为四类：专

著、注解、类编、译著。兵学专著是专门讨论军事活动的著作，兵学注解是对传世兵书的注释和解说，兵学类编是对各种军事资料的编纂，兵学译著是兵学著作的翻译。每一类兵学著作，以其独到的学术成就，对于中国兵学的发展，都有不同的学术价值。

从历史的角度看，兵学有它自身的发展过程，有它自身的学术特点。兵学史是军事史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军事史研究的问题，以战争史为核心内容，包括军事制度、军事学术、军事技术、军事人物等内容，而兵学史以军事学术为研究对象，主要研究理论问题，在研究范围上比军事史狭窄。与此相一致，兵学史是学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学术史研究的问题，从自然到社会，从物质到精神，可以说包罗万象，仅人类社会领域，就包括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、文化等内容，而兵学史主要研究军事问题，在研究范围上也比学术史狭窄。因此，兵学史研究是进一步探讨军事史、学术史的重要环节。

（二）中国兵学的基本内涵

中国兵学，作为中国兵学史的研究对象，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，主要包括兵法、兵略、兵制、兵器、兵家五个方面，并且涉及天文、地理、医药、占候等问题；同时，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、不同的学术基础以及不同的个人爱好，兵学家的研究活动，具有不同的学术趋向。

兵法，即传统军事理论，包括对战争的认识和理解、战争指导的原则和方法，是中国兵学的核心内容。自从进入文明社会，战争作为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，一直被有识之士所关注。研究战争的起源和动因，战争的性质，战争与政治、经济、科学技术、意识形态和自然条件的关系，就形成各种战争观。与战争观相比较，战争指导问题更为复杂，主要包括几个层次：政略、战略和战术。在中国传统时代，大凡战争胜败的预测，战争方式的选

择，军事力量的调配，战争领域的矛盾，如强弱、虚实、奇正、分合等问题，都是兵学研究的重要内容。特别是在实践领域，战争的方式包括三种：攻、战、守。攻即进攻，是对敌方发动攻击；战即交战，是敌对双方交相战斗；守即防御，是对敌方进攻的抵抗。围绕这三种作战方式，中国兵学深究细论，构成一整套作战方法。

兵略，是用于指导战争的谋略，是实施战争的基本方针。与兵法相比较，兵略体现于具体的战争过程，具有突出的实践性；而兵法是对战争指导的探讨，具有较强的理论性。为了总结前代用兵得失，一些兵学家凭借战争史，编撰出不少兵略著作，如司马彪的《战略》、李筌的《阡外春秋》、陈禹谟的《左氏兵略》、胡林翼的《读史兵略》等。这些著作或者汇集历史上一些重大的战争、战例，或者专门辑录某一部著作所载的用兵方略，对于研究中国战争史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。

兵制，又称军制，是有关军事活动的各种制度，包括军事领导体制，武装力量体制，兵役制度，军队组织、管理、指挥和训练制度，军官培养、选拔和任免制度，后勤保障制度等。在中国古代史上，君主操纵兵权，将帅统领军队；军队主要由中央军、地方军和边防军组成，从车兵、步兵到水兵、骑兵，再到弩兵、炮兵，构成诸兵种编组；在兵役制度方面，主要有族兵制、世兵制、征兵制、募兵制，还有谪兵制、属国兵制、屯田兵制，或者坚持兵农合一，或者强调兵民分离，在不同历史时期里，有着不同的选择；在军事教育方面，既重视知识和技能的训练，又强调思想品德的培养；军官的选拔和任用，侧重于战争实践经验，也注意到军事理论素养。兵制关系到军队建设，是一切军事活动的基础。

兵器，即武器，是直接用于杀伤敌人有生力量，破坏敌方作

战设施的器具。在中国传统时代，兵器可以分为两类：冷兵器和火器。冷兵器是用于刺杀、抛射、打击的武器，包括短式兵器如刀、剑、匕首等；长式兵器如戈、矛、戟、殳等；抛射兵器如弓、弩等。火器是利用火药来杀伤敌人有生力量，破坏敌方作战设施的器具，包括燃烧性火器如火箭、火枪、火球等；爆炸性火器如炸弹、地雷、水雷等；管状火器如火铳、火炮等。在中国兵器史上，兵器的制造和使用，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：从远古到五代为冷兵器时期，从北宋到清中叶为冷兵器和火器并用时期，晚清以后则为火器时期。每个时期兵器的改进，都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反映，代表着军事技术的水平。自唐末使用火器以来，许多有远见的兵学家，都很关注兵器的改进。直到晚清时期，伴随军事近代化的进程，军事技术突飞猛进，近代火器取代传统火器，把兵器的制造和使用，推上一个崭新的时代。

兵家，作为兵学的研究对象，是对传统军事家的通称，包括两种类型：一类主要从事军事活动，一类专门进行兵学研究。前者通常指将帅，在军事实践领域取得非凡的成功，成为兵学研究的对象；后者应称为兵学家，在军事学术领域有着突出的建树，也成为兵学研究的对象。在中国军事史上，真正有所成就的将帅，总是在关注军事学术；而真正有所建树的兵学家，也不可能漠视军事实践。这两类兵家相互促动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二、中国兵学的发展阶段

中国兵学萌发于上古时代，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独立的学术体系，经历秦汉迄明清时期的发展和演变，终结于晚清时期。这一漫长的学术历程，依照兵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，可分为八个阶段。

黄帝时代到春秋中期，是中国兵学的萌芽阶段。夏、商、西

周三代通过战争方式，实现政权的更替，战争和战争指导问题，受到统治阶级的关注。在甲骨卜辞里面，保存着不少利用占卜的方式，进行战争决策的记录。《易经》所包含的军事思想，《尚书》所代表的战争理念，《诗经》所反映的战争情感，《周礼》所记述的军事制度，从每一个不同的侧面，为中国兵学的产生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。《军志》、《军政》两部著作，成书于春秋中叶以前，以其独到的学术价值，成为兵学萌芽的标志。

春秋后期至战国时代，是中国兵学的形成阶段。这一时期包括三个段落：《孙子》立足于战争指导问题，以深邃辩证的军事谋略、周密细致的理论思考、字字珠玑的语言艺术，被后世誉为“兵法圣典”，是传统兵学的代表作；《吴子》、《孙臆兵法》论述战争的性质和根源，进一步探讨战争指导问题，揭示军队建设的原则和方法，为建构兵学体系，作了非常必要的补充；《尉繚子》、《六韬》致力于学术融通，综合以往兵学成果，兼及先秦诸子思想，对于战争、战争指导和军队建设问题，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，代表着兵学体系的形成。

秦汉时期，中国兵学经过系统的整理，在某些方面取得一定的进步。从《吕氏春秋》到《淮南子》，特别是《三略》的问世，在更为广阔的学术背景下，借助于儒、道等学派的观点，丰富了兵学体系的内容。通过兵学文献整理，把传世兵书分为“权谋”、“形势”、“阴阳”、“技巧”四种，形成“兵书四种”的结论。从贾谊、晁错到王符，针对汉代边疆的局势，提出“以蛮夷攻蛮夷”、移民实边等边防思想。在汉魏之际，曹操、贾诩等人注解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等著作，以及诸葛亮对传统兵学的总结，都对兵学的发展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两晋南北朝时期，中国兵学第一次陷入低谷。这一阶段政权更迭频繁，阶级、民族矛盾尖锐，战争连绵不断，本可以促动兵

学的发展，但是，因为两晋南朝统治者的腐败，特别是世族领袖的空谈时尚，以及玄学、佛教、道教的兴起，给兵学带来不利影响，加之阴阳占卜术对兵学的渗透，使得兵学长期处于停滞状态，缺乏原创性的学术成果。惟须注意的是，伴随着民族融合的进程，北方少数民族领袖涉足内地后，对兵学表现出较大的兴趣，在战争实践中加以学习、掌握和运用，使兵学在十六国北朝，得到了一定的传播。

隋唐至宋朝，中国兵学受统治阶级的重视，在许多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。武举制度的确立，武庙、武学的设置，《武经七书》的刊行，有力地促进了兵学研究，推动了军事教育事业。《唐李问对》、《太白阴经》、《虎铃经》，是这一阶段兵法研究的重要成果。《武经总要》作为中国第一部官修兵书，连同《太平御览·兵部》、《册府元龟·将帅部》，则是兵学的系统总结。两宋之际，伴随兵家评论的勃兴，出现了《何博士备论》、《十七史百将传》等著作，而随着兵制研究的崛起，又产生了《历代兵制》、《补汉兵志》等著作。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兵学得到拓展。

元代，中国兵学第二次陷入低谷。辽夏金元的兵学，与两晋南北朝相近，也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，究其原因，既有相似的地方，也有很大的差异，主要有以下几点：落后的社会形态，制约着学术的进步；游牧民族偏重弓马，以骑射为主，而不重视兵学研究；严重的民族隔阂，造成尖锐的民族矛盾，不利于文化发展；宋朝廷对于这些政权，采取文化封锁政策，限制文化交流，尤其是兵学著作的输出。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，辽夏金元的兵学，除部分的学术传承外，不可能有什么进步。

明至清前期，中国兵学经过总结和开拓，在一些与现实相关的方面，取得突破性的进展。《武经直解》、《孙子书校解引类》、《孙子参同》和《武经七书汇解》，是武经研究的代表作；《纪效

新书》、《练兵实纪》，是军队建设理论的创新；《阵纪》、《草庐经略》、《兵经》、《乾坤大略》等，都是兵法研究的新成果。关于边防、海防的研究，编撰出《九边图说》、《筹海图编》等著作；关于火器的制造和使用，编撰出《火龙神器阵法》、《火攻挈要》等著作。《读史方輿纪要》、《灰画集》等是军事地理的代表作。《武编》、《武备志》、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戊笈谈兵》等，都是对兵学的系统总结。所有这些学术成就，把中国兵学推到了顶峰。

晚清 70 年间，是中国兵学的终结阶段。鸦片战争的最后结局，说明中国军事的整体落伍。与西方近代军事学相比，兵学作为一个学术体系，已无法适应战争的要求。因为学习西方坚船利炮，魏源提出的“制夷”方略，在洋务运动中付诸实践。伴随近代社会的转型，军事体系的创新，诸如武器装备的改进，近代军队的创建，武举制度的废除，武备学堂的兴办，在军事思想领域里，发生着急剧的变化。特别是甲午战争后，加快了重构军事学的步伐。《中西兵略指掌》、《兵学新书》、《训练操法详晰图说》等著作，在军队建设、战争指导等方面，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，兵学遂不再占据主流，而让位于近代军事学。

在上述八个阶段里，中国兵学的发展出现过三次高潮：第一次高潮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，有关战争、战争指导和军队建设的理论建构，使兵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；第二次高潮出现在宋代，兵学经过逐步的演变，从私学过渡到官学，形成一个新的局面；第三次高潮出现在明清之际，兵学著作的大批涌现，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以往任何时期，而且在学术探索方面，也有突破性的进展。这三次高潮相互衔接，构成中国兵学史的主要线索。

三、中国兵学史研究的思路

中国兵学史，作为研究中国兵学发生、发展的过程和特点的

学问，与中国军事史、学术史研究相比，显然有着明显的不足，所以，目前研究这一课题，还必须通过系统梳理，充分了解它的研究状况，分析它的认识误区，找准它的研究方法。

（一）中国兵学史研究的状况

有关中国兵学的研究，长期处于尴尬的局面：有兵学而无兵学史。造成这种缺憾的原因，首先是军事学和历史学的隔阂。研究历史的学者往往不重视军事学，因而不了解军事学；研究军事的学者往往不重视历史学，因而不了解历史学。这样就很难从历史学的角度，去研究军事问题；或者从军事学的角度，去研究历史问题。军事历史研究就显得比较薄弱。其次，军事学具有较强的实用性，必须优先考虑现代战争，特别是现代军事科学技术问题，不可能突出传统兵学的地位，因而人们面对军事学术，往往会把目光投向现代军事科学技术，较少地关注传统兵学。再者，中国历代兵学文献浩如烟海，有关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，无疑存在着巨大的困难，迄今只有一部分兵学名著，得到相应的整理和研究，还有相当多的兵学典籍，都未得到系统的整理，更谈不上深入的研究。

不过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，伴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，特别是军事科学的进步，中国兵学史已经被提上研究层面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，并取得显著的成就。这主要表现在：

兵学文献的整理出版，作为兵学研究的基础，较以往有更多的收获。在传世文献方面，先后出版了《孙子校释》、《孙臆兵法校理》、《中国古代兵法译丛》等，特别是《中国兵书集成》，作为迄今最大的一部兵学丛书，共收集兵学著作 119 部 771 卷，包括先秦 19 部 23 卷、汉唐 18 部 29 卷、宋代 15 部 123 卷、明代 41 部 517 卷、清代 28 部 79 卷，虽然未加任何整理，但对研究中国兵学史，有直接的推动作用。在出土文献方面，1972 年山

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《孙子》、《孙臆兵法》、《尉繚子》、《六韬》等，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《太公》等，1978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墓出土的《孙子》，198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《盖庐》，这部分文献虽然残缺不全，但经过整理和注释，为进一步开展兵学研究，提供了一大批新史料。

兵学名著的重点探讨，作为兵学研究的关键，比以往有较大的进展。特别是孙子研究，备受学术界的重视，不断取得丰硕的成果，如《孙子集校》、《孙子会笺》、《孙子兵法概论》、《孙子兵法新论》、《孙子学文献提要》、《孙子评传》、《武学圣典》、《孙子学通论》等著作，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平。《中国古代兵法通俗读物》作为一套知识性丛书，包括《孙子兵法浅说》、《吴子兵法浅说》、《孙臆兵法浅说》、《尉繚子浅说》、《六韬浅说》、《黄石公三略浅说》、《李卫公问对浅说》、《历代兵制浅说》、《百战奇法浅说》、《兵经释评》等，虽然题名为“浅说”，但对每一部兵学名著，也都有较全面的论述。

兵学专题的深入发掘，作为兵研究的重点，较以往有更多的成果。特别是最近10年间，兵学史研究日趋活跃，涌现出一大批力作。如《中国兵书通览》、《中国历代军事思想教程》、《军事学志》（《中华文化通志》第60种）等。一些军事通史著作，如《中国军事通史》，所述每一个朝代的军事变革，都用专门的篇幅论述“军事思想”。《中国军事史》分出“兵法”一卷，专门叙述历代兵学成就。同时，对于许多兵学问题，人们从哲学、军事学、历史学、文献学、管理学、心理学等角度，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，发表了上千篇论文，甚至还把兵学研究引申到相关学术领域，与企业经营、行政管理、体育竞赛相结合，为进一步开展中国兵学史研究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总的来说，中国兵学史研究硕果纷呈，但整体上还相当薄

弱。因为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一部完整的兵学史，却有许多重要的兵学理论，需要加以全面的阐释；没有一套完备的兵学资料，却有许多重要的兵学典籍，需要加以系统的整理；没有一种完好的兵家评传，却有许多重要的兵学家，需要加以深入的评析。在这种状况下，进一步开展兵学史研究，分清研究的层次，找出研究的难点，确立研究的方法，就显得十分重要。

（二）中国兵学史研究的层次

中国兵学史包罗万象，既包括兵法、兵略、兵制、兵器、兵家诸方面，又涉及天文、地理、医药、占候等问题，但从历史研究出发，基于历代兵学家不同的学术趋向，可以分为三个层次：

第一个层次是孙子研究。在中国兵学史上，《孙子》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兵学典籍，并且始终处于核心地位。2500多年来，《孙子》如同一条红线，贯穿于中国军事史的全过程，不仅在军事实践领域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，而且对兵学研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。因此，有关《孙子》的研究，与中国兵学的发展相始终，成为中国兵学史的核心内容。正如明代茅元仪所说：“前孙子者，孙子不遗；后孙子者，不能遗《孙子》。”^① 据不完全统计，民国以前研究《孙子》的著作，共有379种，其中传世274种、存目105种。^② 所以，我们研究中国兵学史，必须关注孙子研究的成就。

第二个层次是武经研究。对于中国传统学术而言，兵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。兵学有《武经七书》，就如同儒学有“四书五经”、“十三经”，道家有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，法家有《韩

① 《武备志·兵诀评序》。

② 参见于汝波主编：《孙子学文献提要》，第10页，军事科学出版社，1994年。

非子》，纵横家有《鬼谷子》。虽然《武经七书》刊行于北宋时期，但每一部著作的成书，都在宋代以前。《武经七书》刊行之后，作为武学的基本教材，受到人们极大的关注，对于中国军事教育和军事学术的发展，有着特殊的作用。因此，有关《武经七书》的研究，就成为中国兵学史的主要内容。

第三个层次是对所有兵学著作的研究。在中国兵学史上，除《武经七书》之外，还有很多兵学著作针对不同的军事问题，进行较深入的研究。有研究兵法的，如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、《孙臆兵法》等；有研究兵略的，如《战略》、《乾坤大略》、《读史兵略》等；有研究兵制的，如《历代兵制》、《补汉兵志》；有研究兵器的，如《火龙神器阵法》、《火攻挈要》等；有研究兵家的，如《将苑》、《百将传》、《续百将传》、《广百将传》等。就兵学类编而言，利用综合分类的方法，对兵学史料进行编纂，有自成一编的，如《武经总要》、《续武经总要》、《武编》、《武备志》；有编入类书的，如《太平御览·兵部》、《册府元龟·将帅部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·戎政典》；有编入丛书的，如《四库全书·子部·兵家类》。这些不同体裁的著作，从各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兵学的特点。

特别需要注意，中国兵学史研究应当区分兵学体系、思想、观点的差别。兵学观点是对战争、战争指导、军队建设诸问题的某一方面有明确的看法；兵学思想是对战争、战争指导、军队建设诸问题的某一方面有完整的认识；兵学体系是对战争、战争指导、军队建设诸问题有系统的理论。只有区分体系、思想、观点，才能理清主次、轻重，对于每一位兵学家的成就，给予准确的学术定位。

（三）中国兵学史研究的误区

中国兵学史研究，时下存在着不少误区，如对于兵学经典的

考证，作出随意否定的判断，构成兵学经典伪托说；对于传统兵法的理解，只看到权变的一面，构成军事思想诡诈说。这些不妥帖的说法，作为传统学术的延续，贻害于兵学史研究，需要加以重点突破。

1. 突破兵学经典伪托说。大抵从宋代开始，伴随疑古的风气，形成辨伪的学问，一些古籍被判为伪书。^① 仅就兵学著作说，如陈振孙指出：“今武举以《七书》试士，谓之武经。其间《孙》、《吴》、《司马法》，或是古书；《三略》、《尉繚子》，亦有可疑；《六韬》、《问对》，伪妄明白，而立之学官，置师弟子，伏而读之，未有言其非者。”^② 这种疑古的风气，一直延续下来。

直到清前期，疑古的风气复盛，辨伪的学问亦烈。如姚鼐认为：“世所有论兵书，诚为周人作者，惟《孙武子》耳，而不必为武自著，若其余皆伪而已。”^③ 姚际恒撰《古今伪书考》，竟把《六韬》、《司马法》、《吴子》、《尉繚子》、《李卫公问对》、《素书》、《心书》、《风后握奇经》等著作，全都定为伪作者。张之洞编纂《书目答问》，认为“《太白阴经》、《虎铃经》之属，诡诞不经，不录；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多言占候，所言营阵器械，古今异宜，不录；《握奇经》、《三略》、《心书》、《李卫公问对》

① 宋代学者疑古辨伪，涉及面相当广泛，不独诸子遭遇怀疑，即便是儒家经典，也同样受到怀疑。据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所记，在这批学者中间，怀疑《周易》十翼非圣人之作的，有欧阳修、赵汝谈、杨简等；怀疑《古文尚书》和孔传的，有苏轼、朱熹、王柏等；怀疑《诗经》大小序的，有晁说之、郑樵、朱熹、王质等；怀疑《周礼》的，有苏轼、洪迈、胡宏、魏了翁等；怀疑《左传》的，有王安石、郑樵、叶梦得、朱熹等；怀疑《孟子》的，有司马光、李觏、晁说之、叶适等。这股疑古辨伪之风，对后世学术影响极大。

② 《直斋书录解題·兵書類》。

③ 《惜抱軒全集·文集·讀〈司馬法〉〈六韜〉》。

伪书，不录；《武编》、《兵法百言》之属，多空谈，不录。”^① 上述这些成见，虽然所列著作不一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，即对兵书的可靠性，多持怀疑的态度。

民国时期，梁启超梳理清代学术，就古籍辨伪类指出：全部伪绝对决定者，如《阴符经》、《六韬》、《尉缭子》，为汉以后人伪撰；全部伪大略决定者，如《吴子》、《司马法》，大约西汉人伪撰；部分伪绝对决定者，如《老子》中“夫佳兵者不祥”一节，为后人加入；作者及时代错误者，如《孙子》十三篇，旧题孙武作，不可信，当是孙臆所作，或成书于战国末年。^② 这些“考证”的结果，对于兵学史研究，无疑是沉重的打击。

然则研究兵学史，需要有疑古的精神，但不能痴于疑古；需要有辨伪的工作，但不能溺于辨伪。对待古籍真伪问题，固然要持怀疑态度，不能轻信旧说，但若证据不实，而妄下论断；或者攻其一点，而不计全面，就很难分清真伪，理出是非，更加贻误学术。正确的处理方法，在于信则传信，疑则存疑，不随意下结论，即使某些兵学经典，确实有伪托之嫌，也不能随意抛弃，经过必要的说明，同样可以作为史料，发掘它的学术价值。

2. 突破军事思想诡诈说。历史上，兵学的研究和传播，当乱世竞争之时，或值靖边戡乱之际，会受到统治者的重视。但是，在专制主义条件下，兵书往往被列为禁书，或者藏之深宫，秘不示人；或者寓禁于征，任意改毁；有一些学者，出自传统政治、道德观念，也来贬斥兵书的价值。如宋代苏轼认为：“兵者

① 《书目答问·兵家》。按《张之洞全集》本段引文，有两处错误：“登坛必究”作“登坛不究”，“三略心书”作一部书。今据实径改。

② 详见梁启超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《梁启超全集》第15册第4561页，北京出版社，1999年。